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46

2009年8月14日

從《水滸傳》的高衙內說到嚴嵩父子、 王安石父子、蘇洵父子以及盧武鉉的高山跳崖

復旦大學歷史系 朱永嘉

一、高衙內與林沖

《水滸傳》的故事，是從高衙內調戲林沖娘子引申開去，然後才有林沖雪夜上梁山，這樣梁山泊 108 將的故事才逐個展開。衙內這個詞在五代宋初才逐漸流行起來，成為官府子弟的通稱。五代時割據各地的藩鎮都設有衙內都指揮使、衙內都虞侯等，是那些藩鎮將領身邊的跟班或親隨，以故舊子弟為之。故而衙內成了官員子弟的通稱。高衙內，是高俅的螟蛉之子，而高俅本來是一個破落戶子弟，他惟一的強項就是踢得一腳好毬，由於官員的轉輾推薦，到了駙馬爺王晉卿府上做了駙馬的親隨。駙馬派他送禮品去端王府，憑

這一腳好毬博得端王的青睞，這個端王也就是後來的徽宗皇帝。端王即位後高俅一路攀昇成了太尉，而他的螟蛉之子高衙內也就倚勢豪強專一淫垢他人妻女而成為開封地區的花花太歲。如果他出生美國或許可以登陸《花花公子》的封面了。《水滸傳》的故事便從高衙內在岳王廟調戲林沖娘子逐步展開，第一次調戲就被林沖撞散了，高衙內不肯罷休，於是便有了高衙內身旁的親隨安富和陸虞侯即陸謙設計騙林沖娘子去陸家。這次高衙內的色情活動又被林沖給沖散了，陸虞侯家也被林沖砸了。接著便是陸虞侯為高俅設計在白虎堂陷害林沖，把林沖發配滄州，將林沖弄個家破人亡。林沖發配去滄州的路上，陸虞侯一次又一次地設計害死林沖，才有陸虞侯火燒草料場，林沖怒殺陸虞侯與富安這二個專門為高衙內使壞的小人，那樣就把豹子頭林沖逼上梁山了。這就成了衙內們與百姓們矛盾激化的結局。這個結局也就是官逼民反。中國歷史上週而復始的農民運動，也就是這對基本矛盾的運動形式而已。高衙內這個故事當然是作者施耐庵虛構的，然而這樣的故事，也不是作者能憑空編造出來，它畢竟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概括，並加以典型化的再創造，多少戲曲和電影便是由這個故事演化而來，使它成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民間故事。這個故事背後又有著深刻的社會思想內涵，透露著人們對善良的期待，對醜惡的鞭撻。在這個故事中，不僅僅高太尉、高衙內這些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形象被刻畫得活龍活現；如陸虞侯、富安這樣的小人的卑鄙醜惡也表現得細緻入微；林沖和魯智深那種善良和不得被迫走上反抗和鬥爭的道路也描繪得惟妙惟肖。路見不平一聲吼正是形象地刻畫了水滸精神。文學作品的好處是它把故事典型化，使人們聽了看了就覺得那故事中的人物就活現在自己身邊一般，從而通過形象把水滸精神浸透在中華民族每個善良人們的心田之中，衙

內和陸虞侯那樣的小人成為世世代代人們心中醜陋憎惡的形象，幾乎成了老百姓心頭評判人物的一桿秤。

二、嚴嵩與嚴世蕃

我們翻開中國的歷史，如高俅與高衙內那樣父子狼狽為奸的案例也可以找到一些，如明代的嚴嵩與其兒子嚴世蕃就是非常典型的。嚴嵩是嘉靖帝寵信的權相，他六十歲時，入直文淵閣，他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故嘉靖帝稱其“忠勤敏達”。嚴嵩的本事便是“一意媚上”，借此以竊權關利。後來嚴嵩老了，凡事皆仰仗於其子嚴世蕃，嘉靖所下手詔，惟世蕃能一覽瞭然，答語無不中的，嵩旦夕直西內，諸問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是世蕃別號，實際上朝廷大事便一皆委於嚴世蕃，而世蕃又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於是以饒瘠賣官，毫髮不差。嚴世蕃在京師治第，連三四坊，掘水為塘，方圓數十畝，又好古玩書畫，所見輒索之富人與官宦人家，必得而已，且耽女樂，好縱淫樂於家，居母喪亦然。正由於嚴世蕃過於張牙舞爪，成為眾惡所歸，敗於其客羅龍文，私通倭寇汪直，多聚亡命，謀外投日本，又有其班頭牛信，在山海關誘致外兵，內外相應，因此而被斬。籍其家，有黃金三萬餘兩，白金百餘萬兩，珍寶玩物之值亦數百萬兩。此後嚴嵩以84高齡寄食墓舍而死。在嚴嵩與嚴世蕃身旁還有趙文華、鄔懋卿那樣的無恥小人。

三、王安石與王雱

另一類案例則是其父地位很高，其子也有才學，若是過於恃

才傲物張揚於世，由於其父處於風口浪尖，那麼他們往往也難逃惡名。王安石與其弟王安國，子王雱則屬於這個類型。王安石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一個著名的改革家，文學上也有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出生於書香門第，有人統計過其祖、父、兄弟、子在 60 年間中進士者七人，其祖父王貫之，在宋真宗咸平三年登進士；其父王益在祥符八年登進士；其兄王安仁在皇祐元年中進士；其弟王安禮在嘉祐元年中進士；王安石本人在仁宗慶曆二年登進士；其子王雱，字元澤，英宗治平四年登進士；神宗熙寧元年，其弟王安國登進士。王安石則是在熙寧二年 2 月，任參知政事，為神宗所啟用；而其弟王安國是在熙寧四年 8 月充崇文院校書；子王雱是在同一時間任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在熙寧六年四直經局，修三經新義，王雱與呂惠卿同修撰。在王安石執政時期，王安國與王雱在任事上並沒有太出格的地方，而且王雱是一個很有思想很有才氣的青年學者，他在《三經新義》中，對《詩》、《書》的闡釋有貢獻，對《老》、《莊》之學的闡述亦有獨到之處。王安石在位時自己又有才氣，所以表現出睥睨一世、無所顧忌那種狂勁，亦很自然。《宋史·陸佃傳》：“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王雱去世時只有 33 歲。陸佃《祭王元澤待制墓文》講到他“熙寧逢辰，既昌且熾，立談遇主，騰上甚銳。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版圖而稅。”父親有地位，自己又有才氣，從這篇祭文中亦可見其當時有一大批人圍著他轉，他又那麼傲然自恣而咄咄逼人地以天下為己任，這大概就是他的過早夭折的一個誘因吧。古人有言：“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史·王雱傳》稱其：“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萬言，”一副少年得志的氣概，復云：“雱

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那麼年輕就那麼狂妄。史傳更稱其“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宋史》本傳上所載的這件事並沒有事實作根據。經許多人考證這是邵伯溫在《邵氏見聞錄》中編造的，然而它在某種程度上亦反映了王雱那種傲慢而睥睨一世的精神狀態。

如果把蘇轍《乞誅竄呂惠卿狀》與《宋史·王安石傳》聯繫起來看，王安石之敗，實與王雱有關。呂惠卿是王安石啟用的人，蘇轍稱：“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王安國即王安石之弟，此時呂惠卿打擊王安國的目的是阻擾王安石復出，“王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所謂迭相攻擊，指“《三經義》成，加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間隙愈著。雱諷禦史中丞鄧綰，後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奸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這件事還沒有處理完，“雱以囑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於是有人把情況告訴呂惠卿，“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矢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這個“無使上知”的私書，可能是王雱與呂惠卿同在置經局修撰《三經義》時的事，故蘇轍在狀子中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

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蘇轍這個分析還合乎情理。關於王雱之死因，可能由於王安石為“無使上知”這件事，責難於其子，《宋史·王安石傳》稱：“雱憤恚，疽發背死。”王雱原來有病，這次事件加劇了他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王雱死後，王安石實際上已處於閒職了。可見這件事對王安石打擊之大，是它促使王安石與神宗分手了。分手之前，“安石暴縮罪，去‘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婿蔡卞’者，遂與亨甫皆得罪。這二個曾經抱王雱大腿的小人便由王安石上疏而被斥逐。熙寧十年的10月，正式發佈詔令，王安石再次罷相，此後他就退居江寧城外的鍾山，過起詩人和學者的生活。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次年王安石亦告別人世了。

從王安石、王雱及其婿蔡卞之間的種種教訓看：從父輩講，教子要嚴，處事要公，決不能有任何放縱，居高位者更是如此；王雱確實有才，王安石愛之亦深，故薦其子於神宗，其實適足以害之；從為人之子及婿言，切不可借父輩之聲勢作威作福，沾污父輩的聲譽，不然的話，害父害己，一有失著，往往萬劫不復。“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邵氏見聞錄》之類得以流行，連朱熹也引以為據，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化了多少筆墨來為王雱澄清這些不實之辭。王安石、王雱父子之間沒有注意避嫌的問題，這個教訓值得人們永遠記取。我說這個問題決不是為了貶低王安石、王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也決不因為它僅僅是歷史上的個案，而由於它是具有代表意義的典型案例。程頤曾經說：“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二程集·外書》）王

安石、王雱父子婿之間的悲劇，正是應在這三不幸之上。因為權力與才能都不是靠血緣關係所能繼承的，血緣關係只是為你提供一個機會，這個機會得靠你加倍努力，刻苦學習才能掌握它，否則的話，它適足以坑你、害你，人貴有自知之明。所以我還是奉勸有三不幸者不能張揚，夾著尾巴做人為好。

四、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兄弟

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類人物，他們得以名垂青史，既不在於父輩的顯赫身世，亦不在於自身的功成名就，而在於父母的良好教育和自己耿直的立身行事，回觀他們一生雖歷盡曲折和磨難，卻仍為後人所敬仰。如蘇洵與其二子蘇軾、蘇轍便是。我們都知道，蘇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便佔了三席。蘇氏世家於眉州的眉山，眉山處於岷峨之間，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在三蘇中，社會歷史影響最大的不是作為父親的蘇洵，而是作為兒子的蘇軾和蘇轍，比較起來蘇洵最為平庸。據歐陽修所撰蘇洵的墓誌銘，在蘇洵之前，三世都不顯赫，而蘇洵二個哥哥都以文學舉進士，唯蘇洵不好學，而且浪跡在外，故蘇轍在蘇軾的墓誌銘中講到：“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力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范滂是東漢黨錮之禍中表現最為壯烈的。由此可見蘇軾、蘇轍當年所受的教育及他們立身的宗旨。

蘇洵則是在 27 歲方始發憤閉門讀書，二次應考都不中，轉而專研六經百家之說，考究古今治亂成敗及為人窮達出處之事。著《權

書》、《機策》等，以史論起家，也影響了蘇軾、蘇轍治學的道路。史稱其“好賈誼陸贄書，即而讀《莊子》，歎“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在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間，蘇洵帶了蘇軾、蘇轍弟兄倆遊學於京師，得到歐陽修的賞識，兄弟二人同時參加嘉祐二年禮部考試，二人同榜進士，嘉祐六年，二人同時應對制策。蘇軾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論》，而蘇轍因宋仁宗所問便在策文中直接對宋仁宗提意見了，他在文章中說：“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恐。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則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而且直指仁宗後宮生活糜爛無度，“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這次應對制策，蘇軾入第三等，蘇轍入下等，可見蘇軾與蘇轍的出身不是靠家庭的權勢、金錢、地位，而是靠自己的學問和為人的志向。入仕為官也沒有如王雱那樣有父親可以依傍，一切靠自身的才識和努力，及其為人的骨氣。

軾與轍兄弟倆說真話、實話；不說套話假話；該說不時就說不，沒有一絲一毫迎合權勢者的媚骨。面對當時改革和保守兩派，他們對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敢於說不，皇帝老子徵求意見時他們也是實話實說，沒有奉承討好的話。有一次神宗召見蘇軾，問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那是責怪神宗求治太急，許多事欲速則不達，應該順勢而為，則事半功倍。即便是小事蘇軾也敢於提意見。神宗讓開封府市燈過元宵節，蘇軾便諫說：“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在這件小事上，神宗還是聽進去並且改正了。

王安石行新法，蘇軾上書言其不便，並公開與王安石唱對臺戲。王安石鼓勵神宗獨斷專任，蘇軾在策問的試題中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題，顯然成敗不在獨斷專任與否，而在事之得失與是非，被專任之人之才德是否勝任。王安石當然因此滋怒，把蘇軾貶為杭州通判。王安石行青苗法，徵求蘇軾的意見，蘇軾說：“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這話有道理，搞青苗法是為了抑制民間的高利貸，從出發點講，確是良好的願望，問題出在操作層面上，官員隊伍不純，反而滋事生非，正如美國次級債的超前消費，讓窮老百姓也有好房子住，結果鬧出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

神宗崩，哲宗即位，保守派司馬光上臺，把蘇軾請回開封，為中書舍人，蘇軾仍然實話實說，宋代原有差役法，即直接向民間徵發無償的勞役，而王安石執政時，行免役法，按戶等高下出錢免役，由國家僱人服役。司馬光為相，要革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蘇軾又表示反對，他說：“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問題出在基層官員的素質上，司馬光問他該怎麼辦呢？蘇軾說：“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意思是慢慢來，還是一句老話，欲速則不達。司馬光以之問蘇軾，軾的答復與其兄一樣，認為差役之害，半於僱役，結果會是“別生諸弊”，他主張因地制宜，方始“進退皆便。”所以搞休克療法此路不通，如烤烙餅那樣兩面黃，那樣的話老百姓苦矣。所以

在改革派王安石眼中，蘇軾固然是反對派，在保守派司馬光眼中，蘇軾、蘇轍倆仍然是反對派。他們兄弟兩人始終超然於當時改革、保守兩派之外，客觀地就事論事分析事物的成敗得失，不計較個人仕途的坎坷。

五、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

從高衙內說到嚴嵩父子、王安石父子、三蘇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作為一個人自他降生於世起，都生活在各自的社會關係中，有的是與生俱來的，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之上，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如父子、兄弟；有的是以後在社會生活的過程中逐漸建立的，如夫婦與朋友之間，古代有君臣之間，現代生活有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在如何處理相互關係的問題上，就有一個圍著什麼轉的問題，作為子女自然受到父母地位的蔭庇或者限制，但都有一個如何為人的問題，都有如何對待既定的社會關係和如何建立新的社會聯繫的問題。如嚴嵩那樣父子狼狽為奸，固然是極少數，如王安石、王雱父子之間那樣的互相支持，結果幫了倒忙。即便是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的相處，孔子講的君子聚於義，小人聚於利同樣也是適用的，僅僅以血緣關係圍繞利益來旋轉，它的斷裂只是時間問題了。《水滸傳》中的高衙內身邊不是還有陸虞侯、富安這樣的小人物嗎？富貴之家的子弟身邊終還有一群如蛆蠅逐腐一般的小人，逐臭而來，許多事往往壞在這一幫專門使壞的小人物身上。在嚴世蕃與王雱的周圍，我們都能清晰地看到時時都有那麼一些企圖攀龍附鳳的小人物，對這幫子小兄弟們可要留個神，那種阿諛奉承的氛圍往往包含著一個墨墨黑的大染缸。《呂氏春秋·當染》講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

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故為人處事，要所染得當。《呂氏春秋·論人》中講到為人的原則，“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反諸己，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和思想擺正，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因為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中，不可能不接觸社會方方面面的現象，不與各種各樣的人交往；辦成一件事，總得求人相助，在求諸人的時候就有一個善於觀察人的問題，怎麼觀察人？還是《呂氏春秋·論人》中說：“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驗其守，樂之驗其僻，怒之驗其節，懼之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通過八觀六驗才能知道此人的才性，才能知道自己那麼多朋友中，各自的品位；對於不同的人，即便是雞鳴狗盜之輩，也要懂得如何相處，知道什麼是可求，什麼是不可求的。朋友當然是越多越好，但要懂得必須有所區別。當然也不能完全潔身自好，孤芳自賞，那樣什麼事也辦不成。只要自己守身為正，在廣交朋友中，正是你觀察生活、觀察社會最直截的視角。自身正了，也能出污泥而不染。父母、兄弟、姐妹、夫婦各種各樣的親朋故舊種種社會關係，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講，就是社會資本，問題是運作這個資本時，你自己能否正心誠意地為社會、為大眾謀福利；不是完全去謀個人、家族小集團一己之私利。人天然生存在各種社會關係之中，但不是以關係來論人，而是看他在為人處事中，能否擺正各種相互關係，在處理各種關係中才能品味出一個人的品位。二蘇值得人們敬仰的正是這一點。並不在於他有多少金錢和多麼顯赫的地位，如果心術不正，意念邪惡，那麼儘管地位顯赫，金銀山積，作為人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行屍走肉而已。

六、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中國古代在春秋戰國時，有“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說，秦漢以後也有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佔統治地位的時代，如東漢末袁紹一家。《三國志·袁紹傳》便稱“自（遠）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楊彪，“自（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孝相繼，與袁氏俱東京名族云。”實際上這二個大族都敗在曹操執政時期。袁紹與袁術是被曹操消滅的，而楊彪有個兒子叫楊修，樹大招風也許是促使曹操殺楊修的一個重要原因。殺楊修以後，“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獨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後漢書·楊震列傳》）楊彪為什麼講沒有金日磾先見之明，因為漢武帝寵其二子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與宮女戲，為日磾見，惡其與宮女淫亂，遂殺其子。東漢時的世家大族已維持不了五世。東晉南朝也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佔統治地位，但往往難以為繼，唐人劉禹錫有一首題為《烏衣巷》的名詩，其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謝二大家族是東晉南朝的名門望族，朱雀橋在秦淮河上，烏衣巷是東晉世家居住的地區，顧榮與紀瞻是孫吳以來的大族，是王導設法讓這些大族支持晉元帝在江東的統治。《世說新語·言語》寫到：“元帝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這是南下的北方士族與南方士族之間表示合作的一種默契，南方的士族允許北人寄居江左並與之合作，而這個紀瞻便是“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晉書·紀瞻傳》）而以王導為代表自北方南下的琅琊王氏也宅居於此，與王氏並立的謝家，謝安之

後人也宅居於此。據《南史·謝弘微傳》，弘微名密，是繼謝混為後，其本傳稱：“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言：‘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可見那時朱雀橋邊的烏衣巷是當時達官貴人們薈萃之地，劉禹錫過金陵，看到的朱雀橋與烏衣巷已是一片敗落景象了。實際上王謝二個大族在南朝後期，已被邊緣化了，在世族政治的時代，任何一個家族，其顯赫的社會地位都不可能維持太久。

顏子推是南北朝晚期的一個歷史人物，他留下了一部名著《顏氏家訓》，他這部名著的《勉學》篇留下了一段文字，生動地描述了那些世家子弟衰弱以後無聊又無奈的狀況。他說：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僱人答策；三九公燕，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

著作和秘書都是官名，皆為這些世家子弟所壟斷，我把這一段文字用現代話翻譯如下，以便於大家理解。其云：

在梁朝全盛的時候，那些貴族世家的浪蕩子弟，肚子裡都沒有什麼學問，當時民間的諺語講：“能爬上車子不摔跤的娃娃便是著作郎了，只會問候別人身體怎麼樣的人，便可以當起秘書官了。”這些貴族子弟，都拿香料熏衣，面孔上擦粉，口上塗朱紅，乘高檔的轎車，穿高跟的齒履，坐在繡有方格圖案的絲綢坐蓐上，

倚著著色的絲織靠枕，身邊擺著各種古玩，從容進出於那些高宅大院和高檔的消費場所，遠遠看去仿佛如神仙一般，參加明經考試時，便請槍手代替自己回答策問；參加由三公九卿出席的宴會，要吟詩作賦時，便請人為自己代筆。在那個時代，他們也可算是快意於一時的幸福士子了。一旦發生動亂，政治格局發生大的變化，掌管選舉的不再是自己過去的親朋故舊，在朝廷上執政的不再是過去的同夥，這個時候那些世家的浪蕩子想依靠自己的能力不再可能謀得一官半職了，在社會上他們也無一技之長得以發揮自己的作用。到了這個時候，再也不能珠玉其外，只好穿上平民的粗布衣袍，撕去過去的表面現象，露出本來的面目。他只不過像一根呆頭呆腦的枯枝爛木，像一條在山間已經乾枯的溪流，他已變成被戎馬追逐的麋鹿，轉眼之間便被擊斃於溝渠之中。在動亂的時代，貴族子弟確實都變成一批毫無用處的奴才了。

這裡生動地描述了那些僅依血緣關係來維持自己地位的貴族世家子弟，一旦遇到社會動盪不寧時，就完全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能力，成為任人屠戮宰殺的對象了。這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貴家子弟們走向墮落衰敗的難以逃脫的必然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講，父祖輩留下的優越的社會關係，對其子孫後代未必是件幸事，過於優越的生存條件，反而使他們喪失了獨立謀生的能力，在農耕的時代，世家子弟這種敗落的節奏可能還會慢一些，到了現代快節奏的時代，這種敗落往往轉瞬即至，變成現世即報的結局。顏子推這一番話，確確實實是為這些世家子弟著想，他寫這本《顏子家訓》的出發點，並沒有絲毫嘲笑的意味，而是為了告誡他們也包括自己的兒女，應如何警惕和避免這種結局。從這個角度講，當初的上山下鄉、到艱苦的地方去，對那些世家子弟打破錦衣肉食的環境，出去經歷一番磨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一方

面把農村的疾苦、百姓的實際生活能親身體驗到，另一方面通過磨練可造就他們日後的輝煌。如果垮了，那本來就不是一塊料；是玉石，經過打磨總能顯示出其耀眼的光彩。所以我不喜歡那種哭哭啼啼的傷痕文學。火花只能從磨練中誕生，好的文學作品也講災難，從災難中也見人之豪情壯志，蘇軾那許多光輝的作品正是在他經受苦難之中產生的。不要一味埋怨客觀世界，反思一下自己的主觀世界或許能達到更高的境界。

七、不能忘記盧武鉉的教訓

促使我認真思考這個歷史問題的動因是 2009 年 5 月 23 日清晨，韓國庶民總統盧武鉉在登山時跳崖自殺。盧是出身於農民家庭的政治家。盧依靠清廉的承諾來贏得民衆支持，他就職時是以“容納違規和腐敗的時代已經結束”作為號召的。上任時還幽默地說過：“如果想到五年後我們的孩子能否平安無事，就不寒而慄。”令人想不到的這句話竟成了自己不祥結局的預言了。在 2008 年 2 月卸去總統職務返回老家居住後，盧的妻、兒、女及其他親屬在他的任職期內受賄的問題進一步被司法機關提起訴訟。首先是盧的兄長盧建平在 2003 年受賄三千萬韓元，2006 年又因第二次涉案在首爾投江自殺。從 2005 年起他的家人便已被指控在他任內涉嫌收受賄賂，行賄人是製鞋企業泰光實業公司老闆朴淵次，樸被捕後，與盧武鉉家屬受賄的案件相繼浮出水面，盧的妻子權良淑收受一百萬美元，女兒盧靜妍受賄在美購豪宅 160 萬美元，侄女婿哲浩收受五百萬美元，兒子盧建昊涉及三百萬美元受賄案，最終他自己也被檢察機關找去接受詢問涉及收受泰光實業公司六百萬美元的事，從 4 月到 5 月間他的妻兒都陸續被韓國檢察機關

所傳訊。盧武鉉在被檢察機關傳訊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很抱歉讓各位失望。”有數據顯示盧在任職總統期間，其家庭財產從4.72億韓元增加到9.72億韓元，折合人民幣不過250萬元，數字並不大。但這一切卻成了當初他為民主與清廉鼓與呼的反諷，這使他內心世界承受了難以承受的折磨和羞恥，使他難以面對當初選他走上總統職位的韓國民眾，所以在5月23日跳崖前他會在自己個人博客網站上留下“你們忘了我吧”的遺言。盧武鉉這一跳崖行動，還是一種勇敢的精神，為了自己過去曾經承諾的誓言，對因自己親屬的行為帶來的羞恥，他能以死相殉，還是能博得人們廣泛同情的。對於盧這種悲劇性結局，我們如果把它放到哲學層面去思考，這也是一個悖論：人們的思維是趨於理性的，是理想的追求支持著人們生活的勇氣；而另一方面人的行為又往往是趨利的，行為與理想之間往往兩相悖反，盧的悲劇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這兩個層面之間互相衝突的表現，理想是建立在抽象思維基礎上，生活則往往是從現實得失層面來考量；更進一步地看，在這兩個層面上就個人與群體而言更是不一樣，個人有時能克制自己的慾望，在群體中的各個個體則很難大家一致，即便是父子、夫婦、兄弟姐妹之間也難求完全一致。從思維的方法論上講，理學家們便是從經學轉化而來，他們思路的出發點是天理，從性與天道來考量天理與人慾；而蘇軾他們則是從現實出發，從歷史中去尋找它的邏輯結構。蘇軾求學是從讀賈誼、陸贄等的政論起步的，由政論而作史論，故二者思路不同，處理問題的理路與方法也不同。盧武鉉跳崖這個悲劇告訴人們：就抽象的理念出發從個人到社會，難以破解現實生活中的難題，治好一個家庭尚且困難，何況治國呢？盧武鉉的執政，人們給他的評價是無能。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無法迴避如何處理好人際的相

互關係，在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婦之間亦都有義與利的矛盾衝突，都應該設身處地地换位思考，為對方設身處地地想一下，為父者不能做對不起家人的事；為妻、為兒女、為兄弟者，也得設身處地為處於盧武鉉那樣父輩的人想一下，可不能讓他們陷於萬死不劫的火坑。父輩們的輝煌和與權勢相連接的社會關係，並不是為妻兒者巧取豪奪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資本；從社會的角度講，要從制度上給予種種限制，諸如公佈自己及親屬的財產狀況，並說明財產的來源，以接受公眾和輿論的監督。有些事僅靠家族和親屬之間的自律也有難度，兒女們都已成人，並各自都成家立業了，作為父輩對兒女們在做些什麼也不一定完全知情，而且作為如盧武鉉這樣的領袖人物，兒女身旁也自然會有一幫攀龍附鳳的小人物活躍其周圍，並藉以謀取不當的個人私利，更有招搖撞騙之徒利用這一層關係在做壞事。要盧完全瞭解自己子女和親屬在做什麼也難。他畢竟政務在身啊！有時候發現問題後，即便要管不一定管得了，更有投鼠忌器的苦惱。當問題還處於掩蓋狀態似乎大家還能平安無事，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地火，一旦出現裂縫，整個家族勢必處於山崩地裂的狀態，外加黨派鬥爭因素，更會使事態具有無限放大的效應。尤其在現代信息傳遞高度發達輿論完全透明的情況下，地火怎能不冒煙呢？這類問題在過去比較封閉慢節奏的環境下，還可以設法遮遮蓋蓋，至少表面上保持平靜的狀態，讓兒女遠離是非之地，但這也難以持久，畢竟紙包不住火。中國歷史上那些世家大族的經歷告訴我們，父祖對子孫的蔭庇畢竟非常有限，實際上往往是人一走，茶便涼。有些問題不被追究畢竟是出於社會利害的考量，所以為子女者應該懂得父祖輩為自己提供的條件不是都能隨便引進門的，發展還是要依靠自身的勤奮和努力。任何投機取巧僥倖取得的一切，最終都會成為燙手的山芋。最近有個朋友給我講起某一高位者父親與

其兒子之間的對話，父告誡兒說，你在外面做事可要負責，不要給我惹什麼是非，要知足，不要貪得無厭。兒對父說：你可要小心，不要大意失荊州；你一失足，就會害我們與你一起被人家一鍋端。他們父子倆都已有危機感了，有這樣的相互告誡還是好的。這方面的慘痛教訓，不僅中國歷史上有，外國有，我們身邊何嘗少啊！廣東省政協主席、政法委書記陳紹基的案子，就足夠驚心動魄了，他案子的缺口還是從他部下露頭的，然後是他的家屬親戚一起落水，最終追究到他本人。從已經浮出水面的案子看，都可以找到類似的狀況，實際上我們知道的往往還只是冰山的一角。問題不是出在大意失荊州上，而是心地是否擺正，心不正，意不誠，又何以治家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接觸到一些啃老族的狀況，父母一去世，兄弟姐妹之間便忙著為爭奪遺產而紛爭不已，這種現象固然使為父母者寒心，但還是小巫而已。權勢者之家族的子女和親屬中，還有另一類的啃老族，他們啃的是父祖輩過去光輝的歷史和社會關係，把這個作為自己的資本，並且美其名曰“無形資產”，到處炫耀其父祖輩的光輝歷史，借助其父祖留下的社會關係搞投機活動，企圖快速地暴富，那不僅坑了自己，而且毀了父祖輩的光輝革命形象，實際上反而露出自己的無能和卑劣。其實父祖輩的功名業績並不是他們的私有財產，是社會的公共財富。我想把歷史的教訓揭示在大家面前，總還有一點警示作用吧。在思想上多一道防線還是比較好的。所以還是把正心誠意放在第一位，心底正了，邪氣自然不能乘虛而入，這比單純依靠制度制約要好，因為制度上的限制是專門用來對付小人鑽空子的。當然我們的社會絕對不能沒有制度的約束和輿論的監督，所以兩條腿走路更好。